

中国の国史（研究/教科書）において語られる東アジア
——以十三世纪后东亚三个历史事件为例

葛兆光

对于东亚近世史特别是 13 世纪之后的东亚史，有一些事件相当重要。

其中，我想选择三个事件进行讨论。第一个是“蒙古袭来”（1274，1281），第二个是“应永之役”（1419），第三个是“壬辰丁酉之役”（1592，1597）。由于这三个事件都涉及东亚中日韩三国历史，所以，观察作为一国史的国史著作如何描述它们，从中也许可以看出“国别史”与“东亚史”之间的区别，也可以发现，固执于各国立场的历史书写，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历史“死角”和“盲点”。

下面，我选择在中国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国史著作，以（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2）范文澜《中国通史》、（3）郭沫若《中国史纲》、（4）白寿彝《中国通史》为主，同时也参考大陆、台湾、香港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历史著作特别是通史教科书，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

“蒙古袭来”（文永、弘安之役），在日本历史上当然是第一等的重大事件。川添昭二在《蒙古袭来研究史论》（雄山阁，1977）中指出，尽管这一入侵事件最终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征服和殖民结果，但是，它使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有有一个巨大阴影。所以此后日本文献中反复出现有关的回忆、想象和描述¹。研究日本史的原胜郎、研究中国史的内藤湖南，这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也都认为，这一事件对于日本历史很重要，因为从此日本以“神国”自居，有意识地发展自我文化，形成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并挣脱中国中心的“华夷秩序”。

而在高丽，蒙古这一因素，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历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蒙古控制高丽的时代，不仅蒙古人在侵略日本时，高丽是前沿基地，而且蒙古帝国四边扩张中，要不断向高丽征兵，要求高丽为蒙古提供女子，并把耽罗作为蒙古养马的基地，而高丽则从蒙古迎娶后妃，人们用蒙古名字，官吏结蒙古辫发，甚至蒙古统治使整个国家的政治和风俗，都出现严重的“胡化”²。因此在朝鲜史上，蒙古入侵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但是，在中国历史著作中，由于蒙古/元朝被视为“本国”历史，因此这些事件往往被纳入“中外关系史”。由于这是“本国”的历史，所以，虽然也说是这是对邻国“侵略”，但是，一方面中国的历史研究者会视蒙元为本国一个朝代，

¹ 川添书指出，最早是在 1293 年前后，有《蒙古袭来绘词》（京都东山御文库藏，二卷）描述肥后国武士竹崎季长的武功（49 页）；此后江户时代，有临济宗僧侣瑞溪周凤著《善邻国宝记》（1470 年订补）的记载，有儒医松下见林著《异称日本传》上中下三卷（有 1688 年自序）的记载，有津田元顾（？—1784）的《蒙古袭来记》及其养子津田元贯（1734—1815）的《参考蒙古入寇记》。以后，更有大量这类著作，有历史的，有文学的，如《元寇始末》、《蒙古寇记》、《蒙古诸军记辨疑》、《元寇记略》等等。

² 所以宫崎市定说，“中世以后，朝鲜最外国化的时代就是这时（高丽忠烈王以后）了”，载宫崎市定《中国史》（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第三篇“近世史”之三“元”，237 页；一直到辛颺王时代（1376，明朝已经建立八年），高丽仍用北元年号“宣光”，遣使赴元；同时当时的高丽，“城中人编发胡服者已多”，明朝要派使者来，使得高丽宪府急急忙忙禁止“胡服”，“依大明之制，定百官冠服”，吴晗整理《李朝实录中有关明清史料》第一册，76-79 页。

因而把蒙古与日本、高丽之间的这些事件，算在“中外关系”中，因而并不占历史的过多比重，一方面却又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侵略事件算在“蒙古帝国”的身上，似乎是由于蒙古人试图建立欧亚大帝国，才有的扩张行为。

总的来说，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叙述中占的位置很边缘，基本上只是“中外关系”领域中的一个不起眼的事件³，只有简单的过程叙述⁴，偶然有分析，甚至还出现过一些匪夷所思的说法⁵。

二

所谓“应永外寇”（1419）是日本的说法。十四世纪下半叶，整个东亚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元明交替，蒙古帝国变成汉族王朝；高丽变成朝鲜，李成桂建立了新的朝鲜王朝并且得到大明帝国承认；日本的足利义满实现统一，结束了分裂状态，并且希望纳入明朝的朝贡体制。明朝初期特别是内部刚刚稳定的洪武朝，也确立了比较妥协和保守的国际策略，列出若干“不征之国”，从而使东亚三国构成的“国际”开始一个新时代。

但是，永乐皇帝改变了洪武朝的保守策略，对安南用兵，对朝鲜施压。而李成桂与足利义满在1408年去世后，日朝双方政策也都有转变。继任的足利义持改变了其父之策略，他一反足利义满时代圆滑和妥协的外交方式，对朝鲜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⁶。但事与愿违，李朝太宗也是态度强硬的国王，1419年反而出现了朝鲜向日本的对马岛入侵，即所谓“应永外寇”事件⁷，引起了日本朝野巨大震撼。日本有人甚至觉得，这一事件就如同当年“蒙古再袭”，真是巨大的危机。为了防止朝鲜与大明联手，致使日本两面受敌，因此，不能不重新调整日本的外交姿态⁸。这一年十二月，为了解决战争问题，日本派遣博多妙乐寺僧人无涯亮倪去朝鲜，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才算得到缓解。在我看来，这是东亚此后重建均衡国际格局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在日本与朝鲜两国的国史中，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事实上，这一巨变的背

³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增订本，2006）下册449页，在谈到“元朝的对外关系”时，说“元世祖时曾多次用兵侵入邻近国家”，下面只有一句话“至元十一年（1274）、十八年两次出兵日本”。而《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83）虽然有400字左右的叙述，“从至元三年至至元十年，先后五次派遣使节去日本，劝喻日本来朝，日本政府拒绝答复”，但只是叙述两次战役的过程，并没有特别的分析；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下册中，几乎没有提到“东征日本”这一事件。一直到现在，最新的各种历史著作，如李学勤、郭志坤主编“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的温海清著《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也对这个事件根本忽略。

⁴ 倒是西方学者如卜正民在写元明历史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蒙古袭来”这一事件的意义。见卜正民（Timothy Brook）：*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⁵ 如早期出版的一部有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即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南京：钟山书局，1933；商务印书馆，1946）第八章中居然说，经过这两次战役，“日人震蒙古兵威，嗣后襁祠无虚岁云”。116页。

⁶ 如：对朝鲜不用“国王”名义而自称“征夷大将军”，国书上也只写“日本国源义持”，表示日本大将军与朝鲜国王为对等关系，指责朝鲜致日本的国书居然使用大明的“永乐”年号。因为足利义持认为，这是朝鲜以自贬为大明属国的方式，拖累日本也一起降格成为明朝属国。

⁷ 此时，朝鲜太宗试图根本性解决倭寇问题，对日本的对马岛进行袭击，战争中，双方死伤3800人，迫使对马藩年幼的藩主贞盛求和，朝鲜强行把对马归并到庆尚道，还迁徙对马居民到巨济岛。

⁸ 日本对于中国深有戒心，也许是仍然停留在“蒙古袭来”的历史记忆中。李朝朝鲜的《世宗实录》卷十（世宗二年十月癸卯，1420）收录这次使团的通事尹仁甫《复命书》，其中记载：“臣等初到其国，待之甚薄，不许入国都。馆于深修庵。……继有僧惠珙来问曰：闻大明将伐日本，信否？答曰：不知也。珙曰：朝鲜与大明同心也，何故不知。先是，大明使宦者敕曰：若不臣服，与朝鲜讨之。继而使者畏害而逃，故疑而问之”。

后隐隐约约是有明朝阴影的，毫无疑问，朝鲜出兵是得到明朝支持（至少是默许）的。当年，明太祖就向朝鲜说，朝鲜立国的关键，是对付倭寇（“打紧是倭子”），建议朝鲜一方面采取海疆坚壁清野（每三五十里家无人烟耕种），一方面干脆派军队围困日本占据的附近岛屿（着军船围了，困也困杀那厮）⁹。到了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更改变明太祖的稳妥策略，对外逐渐强硬。由于收到朝鲜方面的屡次报告（“大修战舰，欲寇中国”），他对日本相当不满，甚至借口日本以朱元璋画像为箭靶，说出“发船万艘讨之”的威胁¹⁰。显然，朝鲜敢于主动出兵侵占对马岛，与同一年（1419）六月明朝总兵刘江在辽东望海碣全歼登陆的倭寇这一事件有一定呼应关系¹¹。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情况，才使得日本警觉这一事件背后的明朝因素。

可见，日本与朝鲜在应永之乱后的彼此妥协，确实是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明朝最终趋向平衡，形成新的东亚国际格局的一大事件，可是，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历史著作中，这一事件都没有记载¹²。那么，这一东亚史的大事件，为何在中国史叙述中缺席？很值得思考。

三

“壬辰之役/文禄之役”（1592）和后来的“丁酉之役/庆长之役”（1597），比起主要发生在蒙日、日鲜那两件事情来，由于东亚中日韩三国都直接卷入，战争一连数年，投入的兵力也相当大，更牵动各国的政局，因此，在三国的历史书写上，都留下了很多记载。

不过，各国的记载也许有不同。在中国历史著作中¹³，把丰臣秀吉出兵，看做野心膨胀之后，试图建立东亚大帝国的一种“侵略”，这一点，在朝鲜和中国的历史书中，当然没有问题，日本方面也并不否认“侵略”。但在描述战争过程时，各自依据的是己方的记载，站在各自立场，对同样的一个“壬辰之役”，这些记载往往不同。比如，日本方面对于壬辰之役，会凸显明朝的妥协和日本的强硬，日本提出实现和平的条件，包括（1）明朝皇帝女儿与天皇联姻，即类似“和亲”，（2）明朝向日本开放勘合贸易，（3）割让朝鲜南部¹⁴。当时，只是由于急

⁹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一册，洪武二十年（1387），73-74页。

¹⁰ 同上，第一册，永乐十一年（1413），255页；永乐十四年（1416），265页。

¹¹ 这一年（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与日本之间，也出现冲突。六月，“辽东总兵官中军都督刘江以捕倭捷闻”，明朝军队与倭寇在望海碣发生战斗，“擒戮尽绝，生获百十三人，斩首千余级”，《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十三，2141-2143页。又，可以参看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的“日本”部分。

¹² 无论是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的著作皆然。大多数中国通史著作，都忽略这一事件。

¹³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册531-532页，对此有近千字记载，但主要说的是（1）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进一步侵略中国，（2）1593年打败日军最精锐的小西行长军队，收复平壤与开城，日军退守釜山，（3）石星妥协求和平，1597年日军再度入侵，（4）丰臣秀吉死，日军于朝鲜南海被灭，战争胜利。结论是“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朝鲜人民的坚持抗战，而明军的两次援助，也起了重大的作用”（532页）。郭沫若《中国史稿》第六册，572-578页。主要根据吴晗《史料》、《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中朝文献，对整个过程做了更加详细的记录，对于第一次援助朝鲜，与翦伯赞书不同的是，承认只是“形成对峙局面”。但是此书基本不用日本史料，偶尔使用日本方面的论著如林泰辅《朝鲜通史》，还误以为林为朝鲜人。

¹⁴ 这一点在历史资料中就已经有差异了。如万历二十四年（日本庆长元年，1596），明朝派正使杨方亨、副使沈惟敬，赴日本大阪见到丰臣秀吉，据日本文献记载，丰臣秀吉曾经提出“七条”苛刻要求。但在明朝记载中，却似乎是日本求和，明朝居高临下，让日本从釜山退兵，不得再侵略朝鲜，册封日本国王之后，再谈互市问题，对照之下，与丰臣秀吉的“七条”差别太大。以上可参考《明神宗实录》、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诸葛元声《两朝平壤录》等。

于讲和的小西行长没有正确传达这些意思，所以，导致 1596 年明朝使者派遣使者来，居高临下地册封“日本国王”，允许对明朝贡。这才引起丰臣秀吉大怒，发生第二次（1597-1598）战争¹⁵；而中国方面的记载，则完全没有这些内容，相反，中国通史著作中只是强调丰臣秀吉在壬辰之役失败后，“野心不死，为了准备卷土重来，乃假意与明朝讲和，诱明退兵，以便展开新的进攻”，而明朝官员主张妥协，“堕入丰臣秀吉的阴谋之中，陷于被动地位”¹⁶。

很明显，现代的一国历史著作，会为了（国家）自尊，强调各自希望强调的一面。就像中国的历史著作，就一方面会强调中国的支援对于挽救朝鲜命运的重要性，一方面会夸大明朝援军（包括朝鲜）对日本的胜利。

四

如果我们超越王朝的立场，采取东亚史的视野，从东北亚整体的角度去重新看以上三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说，蒙元入侵日本（以及将高丽作为“属国”），不仅引起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在文化上激活了各国的自我意识，使得东亚不再延续“以中国为中心”，逐渐改变政治上的朝贡或册封体制、文化上向汉唐宋中国学习和模仿的风气，开始出现政治上的自国中心主义和文化上的独立意识；“应永之役”的发生以及解决，说明三国之间的彼此平衡，奠定了东亚三国此后数百年的稳定状态，此后，以朝鲜的“事大交邻”为轴心，一方面明鲜之间通过“朝天”维持朝贡体系的延续，一方面日鲜之间通过“通信”维持对等的国家外交。加上海陆两方面的往来贸易，明清中国、李朝朝鲜、藩府日本之间，除了丰臣秀吉那一段时间外，大体维持着较长时间的稳定，建立了东亚国际秩序。而“壬辰之役”的发生，则使得这种稳定的国际关系，受到激烈的震荡，也埋下日后东亚政治与文化认同崩溃的伏笔，不过，在当时它很快就平息，东亚世界又回到“庆长之役”后建立的格局中。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西方坚船利炮进来。

可是，如果历史学家只是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视野只是限制在现代国家的国界之内，不考虑整个区域的互动与联系。那么，就像一开始我所说的，历史就会留下一些“死角”和“盲点”。在中国史著作中，蒙元入侵日本和控制高丽，是蒙古人的世界野心，朝鲜侵占对马，也只是邻国之间的纠纷，至于壬辰之役，中国是朝鲜的国际主义朋友，两国一起战胜了日本侵略军。可是，如果把这些话题放在东亚史里面看呢？

从东亚史与国别史的差异中，让我们看到，历史书写，如果只有一个圆心（国家）的历史叙述，始终会使得历史书写有中心有边缘，中心往往清晰而边缘常常朦胧，当历史仅仅聚焦中心，边缘总是会被舍弃；可是，如果有若干个圆心，划出多个历史圈，在这些历史圈的彼此交错，就会有很多重叠，东亚史也许就是几个历史圈的交叉处。我们提倡“从周边看中国”，也提倡“从周边看日本”、“从周边看韩国”、“从周边看蒙古”，希望在这些彼此交叉的“周边”重新观看历史，也许，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我认为，一个历史学者，既要学会回到历史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去想象历史，也要学会超越国界（现代国家的国界只是后来形成的）去看更大的历史。如果只是站在今天的国家边界，逆向回溯古代彼此交错的历史，很容易形成固定的“中心-边缘”历史构图，因而忽略“边缘”的

¹⁵ 参看佐藤信等《（改订版）详说日本史研究》（山川出版社，2012），234页。

¹⁶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552页。

存在，忽视这些“边缘”在当时可能就是“中心”，这样容易因为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历史差异，形成历史评价的偏颇。

2016年7月于上海复旦大学